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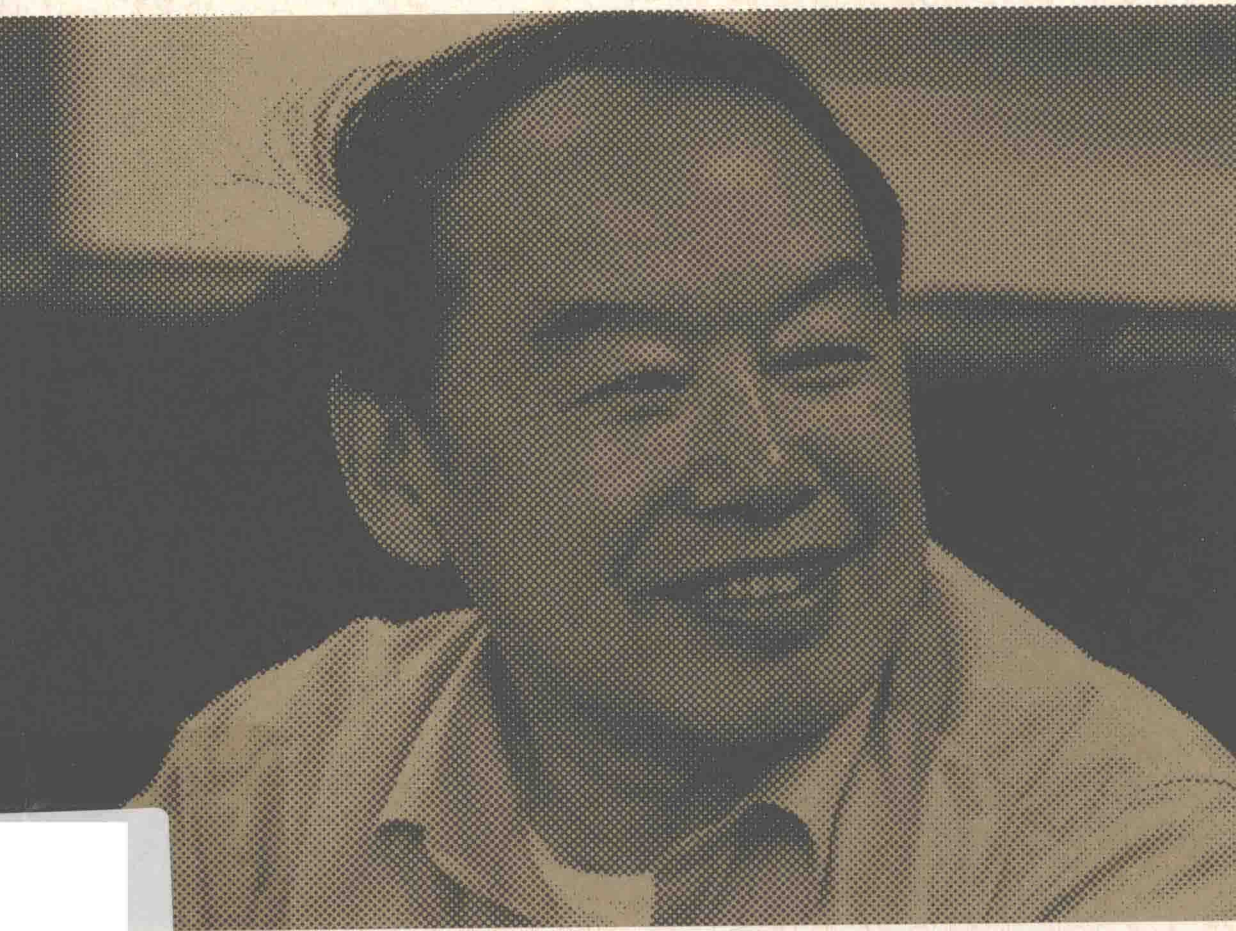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

王岳川 主编

童庆炳评传

吴子林 著

黄山书社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

王岳川 主编

童庆炳 评传

吴子林◎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庆炳评传/吴子林著.—合肥:黄山书社,2016.8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

ISBN 978-7-5461-5393-3

I.①童… II.①吴… III.①童庆炳(1936—2015)
—评传 IV.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8247 号

童庆炳评传

TONGQINGBINGPINGZHUAN

吴子林 著

策 划 汤吟菲 朱莉莉

责任编辑 马德权

装帧设计 未 氓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978-7-5461-5393-3

定 价 4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

王岳川 主编

总结 实践是审美与艺术形成的中介 (材料与基础)

▲ 审美与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是“倾向于并且善于把他人的情感传达于别人，他不满足于独得之欣赏而寻求与他人共川欣赏。”这样，审美也就成了“对每个人无条件的倾向性所要求的促进”手段。”（王元化著《何谓审美》一文）二是社会性又是指通过其审美实践，影响审美，灌注审美，使审美带上艺术形成性。

• 艺术形成之核心，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或价值取向问题。（王元化著）

• 审美实践是个判断，是可以走向“社会认同”。所以，在一切美的文字表述中，它所持有的所谓对丑恶现象之批判以及对美好人生之赞美，皆是以经济个人欣赏、体验、期盼和梦想一形式出之，但又不能反映到他所处之时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期望和愿望。（王元化著《论研究文章》）

总 序

近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论学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断扩张中,艰难地生产着自己的文化和美学新思维,在欧风美雨中不断吐纳吸收的同时变更着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立场。然而,当美学和文论边界不断扩大化的时候,中国美学文论身份却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内,学者们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美学家文论家,却没有看到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性地对中国百年来的美学家文论家加以整体研究的著作。

尤为严重的是,中国美学界文论界在对整个西方美学界文论界加以研究的时候,已经从宏观研究进入到微观研究层面,对西方古典美学家文论家、西方近现代美学家文论家、西方后现代美学家文论家的研究著作已多不胜数,而整个西方对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了解和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种文化美学上的不对等性,导致中西美学界文论界产生

了巨额的“文化赤字”。这种“文化赤字”可能引发的“文化战争”危险,迄今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美学家文论家需在国际话语中重建身份

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其当代美学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中国面对世界,世界不可能背对中国。东方大国的美学文艺学在失去自我身份后亟需重新反省并获得自我身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重新检讨中国美学的精神价值取向,从全盘西化的美学文论研究的盲视中走出来,重新以“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审视中西文化深层对话时代中的中国美学文论身份;从西方美学文论的中国化到中国美学文论经验的世界化的转型中,关注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进而守正创新——“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

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

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元化、多样化。

当代西方文论的全球扩张,深层原因是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播撒。现代性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相关,短短 200 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并走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于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升华的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堕落般的“恶心”。艺术家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对人类后殖民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

西方乘着全球化的翅膀开始了文化霸权的飞翔。霸权是一种在文化领域中争夺“领导权”或“控制权”的话语,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扩张化,使之成为人类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普遍认同。于是,话语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化。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地世俗化,人类精神生态失衡已经习焉不察地成为意识形态符码。

当然,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从而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二、从西方文论中国化到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以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事实上,在文化美学领域中国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美学文论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理论家才能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论光辉和美学神采。

当代中国美学文论流派原创、范畴创新、体系“守正创新”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充分关注的时候,中国文论“守正创新”势在必行。

三、在“守正创新”中整体展示中国美学文论大家

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论应在当代文论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

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中国美学播撒和新理论输出,形成中西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在美学文论创作方式、本体结构、接受方式、传播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美学文论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21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美学图新为了精神原创,这表达了我对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美学观念、美学形态、文论方法、文论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守正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软实力,可以表征美学文论新的大国形象。

当代美学家文论家努力的方向是文论原创性,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美学文论研究了30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不断创新的中国美学文论精英。只有中国美学文论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论的文化输出!美学文论国际互动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美学文论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美学文论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水平开创性学术丛书出版困难的时期,黄山书社决定推出这套《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令人感佩。首批推出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童庆炳

等十位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的评传。评传在“评”的方面突出对所评专家学术成果的评介,在“传”的方面则尽可能地钩沉出所评专家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趣事,使其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通过丛书的出版,力求打破多年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对国外思想家了解较多,而国外对中国当代思想家却知之甚少的局面,为中国当代“文化输出”做一些推动性工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能对这些经历了20世纪欧风美雨的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些跨世纪美学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国际化。

是为序。

王岳川

2015年1月8日于北京大学

自序

时间过得真快,不经意间一回首,便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自己视若生命的学问却长进不多,难免惶惶然起来。于是,稍稍放缓匆匆的步履,看看脚下的足迹,想想不远的未来。

近日品读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学龠》,他在该书中说:

梁任公尝云:“初学勤发表,可助读书。”今人都信此说,乃竞务于找题目,以为有了题目即可写文章。实则读书方面的工夫是荒了。因此在学问上没有入门,而遽求发表,而且多多益善。直到今天,能发表文章的是不少了,但是真能传授后进的则实在太少了。人人无实学可授,如此下演,支离破碎,竟创新见,而并无真学问可见。因此人人都爱讲新思想。但新思想也应有一传统,应须于从前旧思想中有入路,始于其所要创辟之新思想有出路。即在思想家,亦岂能只出不入。今天大家都不求入门,尽

在门外大踏步乱跑，穷气竭力，也没有一归宿处，此病实不小。……经学、史学、文学，今天都不讲求，却高谈中国文化。这样则纵有高论，也难有笃论。纵有创见，也难有真见。^①

联想到今日风行学界的“学位体”“课题体”或“项目体”，对钱穆先生的这般锥心之论敬佩不已！十余年来，身处编辑岗位，自己审阅、编辑了多少这样“千人一面”的文章啊，而自己不也曾以发表了类似的文章而“沾沾自喜”吗？于是，汗颜不已几至汗不敢出！

“学位体”特别是“课题体”或“项目体”之著者一味贪多求快，诚如钱氏所言，病在“不学”，“未曾入，急求出”，“只求表现，不肯先认真进入学问之门”，故来自客观者少，而出于主观者多；由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它们“甚而至于凿空为有，无事生非，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飏于静树。览其大著，构篇虽颇宏阔，发思不乏杼柚，但论述总显得浮泛、空疏，缺乏稳固的支撑”^②。因此，这些自以为“学问”者，“并无真学问可见”，“纵有高论，也难有笃论。纵有创见，也难有真见！”钱穆先生说得好：“学问非以争奇而炫博，非以斗胜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

①钱穆：《学问之入与出》，见《学衡》，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164页。

②李壮鹰：《回归原典：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理意识》，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

之大道。”^①学问之道若不改弦更张,仍在为“稻粱”而谋,仍在为“学位”或“项目”而“打工”,尽炮制些思想贫乏、气味枯索、因注水而浮肿的论著,其前景必是黯淡无疑的。

那么,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学人而言,我们的“出路”何在呢?我们不妨听听钱穆先生的忠告。他在1963年3月8日新亚研究所第37次学术演讲讨论会上说:“我只希诸位能先多注意读书,且慢注意发表。能先注意求入,且慢注意能出。”^②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此言犹萦绕于耳,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钱穆先生指出:

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始可谓之真学问。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得有真思想与真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此不可刻意而求,躁心以赴。^③

在钱穆先生看来,自古迄今,学问能成一家言者,主要在其学问之广博互通:

凡做学问,则必然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兼具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④

学问当通时代,切身世,否则只是识字读书,如蚕吃桑叶,却不吐丝。钱

①钱穆:《学术与心术》,见《学衡》,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②钱穆:《学问之入与出》,见《学衡》,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③钱穆:《学术与心术》,见《学衡》,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④钱穆:《学问之入与出》,见《学衡》,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穆先生指出,进入学问步骤有四:第一步是专门之学(读一书,治一人、一家、一派),第二步是博通(从此专门入,又转入别一专门),第三步仍为专门,第四步是成家而化(既专门又博通,将其所学皆在他一家中化了)。简言之,先“由专而博”,进而“由博返约”,所谓“约”即指其归属于他自己的,亦如《中庸》之所谓“致曲”;“致曲”之后,则又须“能化”,自成其为一家之言^①。钱穆先生云:

今天我们做学问,应懂得从多门入。入了一门,又再出来,改入另一门。经、史、子、集,皆应涉猎。古今中外,皆应探求。待其积久有大学问之后,然后再找小题目,作专家式的发挥。此乃为学问上一条必成之途。^②

为此,钱穆先生还提示了学问的“入门”之径:

从来大学问家,莫不遍历千门万户,各处求入,才能会通大体,至是自己乃能有新表现。即如古人《文集》,好像最空虚,其实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学问,而融化了始能成一大家集。故读大家文集,实应为学问求入门一省力之方法。^③

善做学问者,应能“推寻”而后“会通”,如程子所谓“自能寻向上去”;“推十”而能“合一”,然后“吾道一以贯之”,而成为一“士”,如此亦即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亦即朱子所谓“一旦豁然开朗,而求至乎其极”。“推寻”再“推寻”,“会通”再“会通”,益进而深求之,或可自成一崭新的思想体系,

①钱穆:《学问之入与出》,见《学衡》,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58页。

②钱穆:《学问之入与出》,见《学衡》,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③钱穆:《学问之入与出》,见《学衡》,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拥有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而具备引领思想之力量。环顾今日学界，能践履上述学问“四部曲”，治学而不致支离破碎，出才情、出见地、出思想、出断制者，又有几人呢？童庆炳先生算得上其中一位。

童庆炳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在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史上，童庆炳是国内文艺思想自成体系、屈指可数的学术大家之一。数十年来，童庆炳在审美诗学、心理诗学、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化诗学、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以及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等诸多领域里，纵横捭阖，著述等身，卓然成一学派，并以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始终引领着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先生还是著名的教育家，精心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硕士生，其中包括著名的当代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迟子建、严歌苓等。迄今为止，童庆炳培养出了文学博士80余人——其中大多数已成了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术骨干与学科带头人，深刻影响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发展进程，有着“童家军”之美誉……面对这些丰硕“果实”，童庆炳心若止水，他喜欢不倦地劳作，特别欣赏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的人生格言是：“无待乎外，有待乎内。”在先生看来，自然而然，随遇而安，又总能不断发现美的境界，不失为人生的极境……

——童庆炳所抵达的，是无数学人梦寐以求的“极地之境”。

纵观中国古今学术史，那些抵达“极地之境”的学问家，仿佛耸立在我们眼前的喜马拉雅一般，在让我们景仰的同时，也期待着我们“翻越”或“超越”。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代诗人安琪有一首名诗《风过喜马拉雅》：

想象一下，风过喜马拉雅，多高的风？/多强的风？想象一下翻不过喜马拉雅的风/它的沮丧，或自得/它不奢求它所不能/它就在喜马拉雅中部，或山脚下，游荡/一朵一朵嗅着未被冰雪覆盖的小花

居然有这种风不思上进，说它累了/说它有众多的兄弟都翻不过喜

马拉雅/至于那些翻过的风/它们最后,还是要掉到山脚下

它们将被最高处的冰雪冻死一部分/磕伤一部分/当它们掉到山脚下,它们疲惫,憔悴/一点也不像山脚下的风光鲜/亮堂

我遇到那么多的风,它们说,瞧瞧这个笨人/做梦都想翻过喜马拉雅。

作为中国文艺学界的一座“高峰”,童庆炳的学问之道是极好的典范,当能沾溉年轻一代的好学深思之士。学者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著作,而学者生活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学术研究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研究童庆炳不仅可以向世人展示中国学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昭示中国未来文学研究的路向。以是之故,当我写完《童庆炳评传》,就自然想起了安琪的《风过喜马拉雅》: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想做一个“笨人”,“做梦都想翻过喜马拉雅”吧。

十六年前,先生不拘一格地录取了我,拯救了困厄中的我,生命由此整个儿翻转!英国诗人奥顿说过:“人是唯一意识到事物发展无限的生物。”置身于社会变革最为疾速、价值体系最为混杂、精神思想最为多元的时代,最难得的是“安魂”二字。正是先生的指引,让我择取了文学这项健康的事业,借助内心的道路或路线,揭示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东西,探索隐匿其中的终极情致,生命得以自由舒卷、绵延,此乐何极!

两个月前,先生溘然离去。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世界仿佛坍塌了一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只能凭借个人顽强的意志,奋然而前行!此时此刻,唯有以此拙著纪念先生;此时此刻,想起先生指导本书写作时的诸多勉励,不禁心潮澎湃,哽咽无语……

2015年8月14日